

王
安
石
詩
文
選



王安石诗文选

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一九七三级师生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王安石诗文选

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一九七三级师生

*

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119,000字

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71·140 定价：0.55元

目 录

前 言	1
-----------	---

诗 词

河北民	19
省 兵	21
兼 并	24
感 事	27
收 盐	31
秃 山	33
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访茶法利害见寄	36
明妃曲(其一)	44
登飞来峰	48
耒 耜	49
苦 雨	51
郊 行	53
促 织	54
白沟行	55
出 塞	57
入 塞	58

阴山画虎图·····	59
详定试卷(其二)·····	63
次韵酬子玉同年·····	66
次韵元厚之平戎庆捷·····	69
后元丰行·····	71
元 日·····	74
商 鞅·····	75
贾 生·····	77
诸葛武侯·····	79
宰 嚭·····	83
乌江亭·····	85
窥 园·····	87
开元行·····	89
众 人·····	92
即 事·····	94
偶成二首(其一)·····	96
鸥·····	98
孤 桐·····	99
古 松·····	101
与舍弟华藏院此君亭咏竹·····	103
北陂杏花·····	105
六 年·····	107
读 史·····	109
桂枝香(金陵怀古)·····	111

散 文

本朝百年无事劄子	117
√ 答司马谏议书	129
√ 答曾公立书	136
答李资深书	141
上杜学士言开河书	144
游褒禅山记	151
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	156
答曾子固书	162
太 古	168
委 任	171
风 俗	180

文 论

张刑部诗序	189
上人书(节录)	192
上邵学士书(节录)	195

前 言

王安石(公元一〇二一——一〇八六年)字介甫,抚州临川(今江西临川)人,是北宋时期主张前进变革、反对复古守旧的一位杰出的法家,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。列宁称他是“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”^①。他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,青少年时代,跟随父亲到过不少地方,接触了许多现实生活,逐渐觉察到一些社会政治问题,他开始有“矫世(矫正社会)变俗(改变习俗)之志”。公元一〇五八年(嘉祐三年),他写了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,要求对政治有所“改易更革”。公元一〇六八年(熙宁元年),宋神宗召见他,他又上《本朝百年无事劄子》,指出“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”^②,如不进行改革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公元一〇六九年(熙宁二年),宋神宗任用他为参知政事(副宰相),次年,又任他为同平章事(宰相)。在神宗的支持下,他开始实行变法。

王安石的变法,是在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

① 列宁:《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》注②。

② 引文见本书第一二四页。以下引用王安石诗文,如系本书已选入者,均不再注明。

的基础上提出的。

北宋从开国以来，一直奉行“不抑兼并”、“不立田制”的政策，大官僚大地主霸占全国耕地十分之七，并享有免役、免税等特权，农民所受的剥削愈来愈重，而北宋王朝的财政收入也受到很大影响。军事上，北宋王朝实行雇佣兵制和“养兵”政策，为了防止农民起义，把破产农民和受灾饥民经常收容到军队中去，使军费开支庞大，高达全国财政收入六分之五。在当时我国出现几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中，又采取“守内虚外”的方针，把大部分军队驻扎在内地主要州郡，对于北边的辽和西夏贵族统治者的侵扰，却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，只得纳献银绢，屈辱求和。这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，农民的反抗斗争因此经常发生；农民起义接连不断，而且越到后来，规模越来越大，战斗力越来越强。到十世纪末，王小波等领导的农民起义，更明确地提出了“均贫富”的战斗口号。

出于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，王安石也是反对农民起义的。他之所以主张变法革新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防止农民起义。他在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中说：不要依靠天赐的侥幸来获得国家的安宁，要防止像汉末的黄巾和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那样的突然事件。要从这样一些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^①。在《耒耜》一诗里，他还用锄头等普通农具

① 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：“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，而无一旦之忧乎？盖汉之张角，三十六方同日而起，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。唐之黄巢，横行天下，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。汉、唐之亡，祸自此始。”

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发挥的无比威力，来告诫当时的统治者。但是，王安石在反对农民起义的同时，一方面又在自己所提出的“损有余以补不足”等口号中，反映出农民起义的影响。对这些口号，我们只要稍作分析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，正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，促使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去坚持变法革新的政治斗争。

北宋时期，正当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激烈的时候，大官僚大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，把孔孟之道加以改造发展，形成一种极端唯心主义的思想学说，这就是所谓理学。他们用它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控制，反对一切改革措施，使得“积贫积弱”的局面无法改变，社会危机越来越深。王安石要革新变法，就要推翻这样一条思想路线，建立自己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路线。他继承荀况以来法家的天道观，发展了朴素唯物论的“五行说”，认为天地万物由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物质元素变化生成^①，从而否定了天是有意志的存在。针对儒家门徒吹捧孔孟之道的实行或废止是由天命决定的谬论，他责问说：如果认为世事都由天命来决定，那么要人来干什么呢？^②这是对儒家“天命观”的有力抨击。王安石还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停地变化发展的：“天文之变无穷，人事之变无已。”^③而变化发展的原因则是事

① 见《洪范传》。

② 《行述》。

③ 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六九引。

物内部的“耦”(ǒu偶)，即矛盾的两个对立面；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不断变化发展，于是万物也随之永远变化发展^①。基于这种认识，王安石提出“新故相除”^②的观点，认为新生的东西一定要代替陈旧的东西，斥责那些搞复古的人不是愚蠢就是存心欺骗。

正是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导下，王安石制订了他变法革新的政治路线。

王安石的变法，主要是对内反对豪强兼并，对外主张强兵抗敌，这正体现了先秦法家“以耕战致富”的思想。他针对北宋的社会危机，希望通过理财解决“积贫”问题，通过整军解决“积弱”问题。所谓理财，就是实行青苗、免役、方田均税、农田水利等各项新法，促进农业生产。所谓整军，就是实行保甲、保马、将兵等新法，提高军事力量，抵抗辽和西夏贵族统治者的侵扰。为了保证这条政治路线的实行，他继承法家尚贤使能的思想，主张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的政治特权，提出“任人唯贤”的组织路线。

二

在阶级社会里，“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，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”^③。王安石从朴素的唯物论

① 《洪范传》：“五行之为物……皆各有耦。……耦之中又有耦焉，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。”

② 《杨龟山集》：《〈字说〉辨》引。

③ 毛泽东：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见《毛泽东选集》合订本，第八二二页。

出发，主张文人应博览群书，应接触社会生活，反对当时儒家文人欧阳修、程颢、程颐、司马光之流所宣扬的只读儒家经典和“道为文心”等唯心主义观点。他面对现实，强调文学必须“有补于世”，也就是为变法革新服务，这同当时儒家文人要求“文以载道”，即文学必须载孔孟之道，为维护大地主大官僚利益的反动路线服务是针锋相对的。为了“有补于世”，王安石强调文学“以适用为本”，而把“刻镂绘画”的形容修饰放在第二位，反对贵族官僚和儒家文人的形式主义文风。王安石的文艺路线（包括文艺主张和作品）充分反映他的政治路线，有力地在他的政治路线服务。围绕着推行政治路线的需要，他的诗文内容有三个主要方面。

一、暴露“积贫积弱”的社会现实，揭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。

王安石在变法前夕写的《感事》诗，是北宋怵目惊心的社会矛盾的缩影。作者从大量生活中概括出来的典型细节，不仅反映了人民的深重苦难，而且还尖锐地揭露出：正是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掠夺，促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，严重危及北宋王朝的统治。这是作者的忧虑，也是他提出变法的社会根据。这首诗和《兼并》、《本朝百年无事劄子》等诗文，都表现了他要求变法革新的迫切心情。

北宋的阶级矛盾是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，呈现出更严重、复杂的状况。王安石在《河北民》里描述了临近辽和西夏统治区居民的苦难生活，揭露了顽固派搜刮民脂

民膏以供奉辽和西夏贵族统治者的罪行。由于顽固派的“守内虚外”，妥协投降，才招致辽和西夏贵族统治者的贪得无厌，不断侵扰。这不仅给北宋统治区的人民，以及辽和西夏统治区的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，而且使得北宋王朝危在旦夕。王安石变法革新正是为了扭转这种局面，以缓和阶级的和民族的矛盾，挽救北宋王朝的政治危机。

二、提倡除弊兴利，宣传变法主张。

这是王安石诗文最主要的内容。王安石主张“理财以农事为先”，就是通过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掠夺以及大商人的重利盘剥，发展农业生产，增加北宋王朝的财政收入。他的诗文明确宣传法家这种“重农抑商”的经济思想。

为了“富国以农”，王安石推行青苗等新法。他在《答曾公立书》中，从各方面论证了实行青苗法及低息取利的必要性；在《上杜学士言开河书》中，提出组织民力、兴修水利、发展生产的主张；在寓言诗《秃山》中，反对攘夺破坏，坐吃山空。他还写了《耒耜》、《水车》、《樵斧》等十五首农具诗，这对于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，是难能可贵的，也说明王安石重视运用文艺来宣传他“富国以农”的变法思想。

在军事方面，王安石的诗文突出地表现了他要求强兵自卫、反对妥协投降的主张。他曾奉命伴送辽王朝使臣，在途中写了《出塞》、《入塞》诗，反映了辽王朝统治下的燕州汉族人民遥望南天，热泪纵横，盼望解除民族压迫的心情。在同时写的《白沟行》里，他借古代故事批判妥协投

降路线，要求选拔良将，抗击辽王朝贵族统治者。

为了推行新法，王安石十分重视用人问题。他很不满意北宋王朝的用人路线，在《兼并》诗中指出用人不当，让贪官污吏和孔孟之徒当权，势必阻碍变革，助长兼并，加深北宋的社会危机。在《开元行》里，他更进一步指出用人不当的严重后果：“由来犬羊著冠坐庙堂，安得四鄙无豺狼？”说明用人问题同政治路线是紧密相联的，关系到社会的安危，政权的存亡。为了给推行新法培养人材，他改革了科举制度和学校，将自己用法家观点著述的《三经新义》代替“先儒传注”，用“新学”反对“理学”，培养选用具有“三不足”精神的人才，为变法扫除障碍。

三、反击顽固派的猖狂进攻，捍卫变法革新的政治路线。

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派恶毒攻击新法，散布所谓“敬天”、“法祖”等反动叫嚣，王安石则以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的精神，积极进行战斗。王安石的“三不足”，也是对孔丘的“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”的尖锐批判。他在《众人》诗中，蔑视地指出：“众人纷纷何足竞，是非吾喜非吾病。”“乃知轻重不在彼，要知美恶由吾身。”全诗反映出作者高踞于群儒之上，力排众议，藐视敌人，对自己的行为坚信不移，对新法的实行充满信心。司马光之流眼看诽谤咒骂无济于事，又装出老朋友的姿态，接连给王安石写信，加给他种种罪名，要求他停止变法。王安石在《答司马谏议书》中，义正辞严地予

以驳斥，并揭露顽固派“不恤国事，同俗自媚于众”的丑恶嘴脸，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“不见可悔”的决心。

围绕王安石变法的这场前进与倒退、革新与守旧的斗争，是先秦以来儒法斗争的继续。王安石继承历史上法家人物的思想和路线，写了许多颂扬法家、批判儒家的战斗篇章。比如，在《商鞅》一诗里，他说：“今人未可非商鞅，商鞅能令政必行”，高度肯定了商鞅赏罚严明、令行禁止的做法，针锋相对地回击了顽固派司马光之流的诽谤。在《乌江亭》里，他针对为项羽唱挽歌的反动论调，明确地指出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必然失败，不会再有人为他卖命，卷土重来是不可能的。

围绕王安石变法而开展的这场儒法斗争，与先秦时期的儒法斗争有着不同的特点。它已经不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向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斗争，而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革新与守旧的路线斗争。由于地主阶级日趋没落，孔孟之道被抬到了吓人的地位，因而斗争形式不得不由公开的尊法反儒，变为有时借用儒家的旗号来宣传法家的思想；而在实际上又往往不能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。我们从王安石的诗文中，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。

三

王安石诗文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，也反映出这位改革家的战斗风貌。

他的诗文的一个重要特点，是政论性强，逻辑严密，

说理透彻。他的重要散文大多数是政论性的。他的政治主张主要反映在他的政论文中。这类文章有的洋洋万言，如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，论证充分，分析绵密；有的字数不足二百，如《太古》，抓住关键，要言不烦。但不论是长篇还是短制，大都做到了语言精确，观点鲜明，逻辑严密，转折自然，具有雄辩的说服力。

王安石不但善于在奏章、杂论、书信这类体裁中直接发表议论，而且还善于在游记、题名记这类记叙文中，使景物、事件的具体描述与关于哲学、政治的抽象说理结合得非常自然，不露牵强生硬的痕迹。

《游褒禅山记》就是这类作品。这篇作品记叙他和一些人游华山后洞，越往里走，所见越奇妙，但行进也越困难；他们为困难所阻，半途而返，游览不得尽兴。由此领悟到一个道理：“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，而人之所罕至焉；故非有志者，不能至也。”这个道理使人不容置疑，因为它确切有据，是由游山一事自然总结出来的。文章最后又回到记叙上来，不失游记之本。这是一篇夹叙夹议，以游记形式阐发人生哲理的好散文。

《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》，从题目看，无疑应是记叙文。但作者却借题发挥，用主要篇幅来直抒政见，详尽论述理财、善法、择吏三者的关系，使中心内容变成说理。而所说之理，又与度支（财政）副使（官职）有关，这样借题又不离题，放得开又收得拢，逻辑严密，结构也很紧凑。

利用诗歌来直接发表政治主张，从而把诗歌散文化，

是宋诗中比较普遍的现象。王安石在这方面更有特色。他善于充分利用古体诗篇幅、句式长短不拘，韵律也比较自由的特点，写出不少好诗。《省兵》就是一例。这篇诗没有急于回答应否“省兵”的问题，而是先说“省兵非所先”，然后纵笔叙写军政的腐败，不但充分揭露将帅非其才，兵卒习于骄惰，而且把矛头指向造成这一局面的雇佣兵制和养兵政策，由此表明根本问题在于军事上的变法革新，究竟应否“省兵”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全诗首句“有客语省兵”，末句“省兵果有年”，前后照顾，中心联贯，显示出王安石的古体诗论证充分、说理周密的优点。

在古体诗中发议论比较容易，唐宋诗人就有很多佳作；但在律诗绝句中发议论的还不算多，写得好的就更少了。王安石在这方面却很擅长。他常常抓住带根本性的东西，因题生意，三言两语就把道理说得明白透彻。如绝句《宰嚭》，首先提出“谋臣本自系安危”这一雄辩而重要的命题，然后把西施与宰嚭相比较，自然得出“贱妾何能作祸基”的结论，从而表现作者在用人问题上的法家观点。

王安石在政治思想上是个改革家，在文艺方面同样是个改革家。因为他是个改革家，常常要揭发时弊，阐述政见，这就要求表达直截，旗帜鲜明，而政论这种体裁和特点，也就成为最适用的东西了。他既是个改革家，就不能容忍陈旧的俗套和僵死的观点，因而脱出窠臼，别创新意，也就成为他作品艺术表现上的又一个特点。

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，一些御用史官和孔孟之徒往往

以陈腐的传统观点，去评价古代的历史和人物，歪曲事实真相。王安石对此深为不满，主张对旧说要“深思而慎取”。在《读史》诗中，他更指出：“当时黯黯犹承误，末俗纷纭更乱真。糟粕所传非粹美，丹青难写是精神。”王安石要求“慎取”，要求传下“粹美”，去掉“乱真”的“糟粕”，所以他的诗文总是体现出洗旧创新的精神。

比如，在一些咏史、怀古诗里，王安石站在法家立场上，批判儒家观点，对历史事件和人物重新作了评价。《明妃曲》和《辛谿》就是两首这样的翻案诗。前者，他揭露王昭君的不幸遭遇，主要是由于尊儒反法的汉元帝昏淫误国造成的，从而替画师毛延寿翻了案；后者，则批判了儒家“女人祸水”的荒谬理论，指出吴国的灭亡，是由于任用了通敌受贿的辛谿，而与玩弄的无辜妇女毫不相干，从而替西施翻了案。此外，像《窥园》、《贾生》和《乌江亭》等诗，同样都是洗旧创新的佳作。

此外，王安石的诗文，在重视思想内容必须“有补于世”的前提下，也很注意艺术上的锤炼。在《上人书》中，他这样回答自己的设问：“不为之容，其亦若是乎否也？然容亦未可以已也，勿先之，其可也。”他首先强调思想内容，然后指出形容修饰即艺术锤炼的必要性。这充分表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上，从而使他的艺术锤炼根本区别于宋初西昆体的形式主义。

王安石的散文在唐宋作家中是享有盛名的。它在艺术锤炼上的独特之处，是概括性极强，语言朴素精炼，简洁